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中的人性

〔英〕格雷厄姆·沃拉斯 著



888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中的人性

〔英〕格雷厄姆·沃拉斯 著

朱曾汶 译



200018569

商务印书馆

1996年·北京

2.30/0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2年先后分六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七辑。到1997年出版至30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4年3月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出版说明

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 又译华莱斯),英国政治学家和教育家,倡导用实验方法研究人的行为。1858年生于散德兰,卒于1932年。1877—1881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后在该校执教;1890年起,先后任大学公开讲演讲师、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皇家行政事务委员会委员、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波士顿大学娄厄耳讲座讲师。沃拉斯1886—1904年参加费边社,并成为英国费边运动的领袖之一和重要理论家,后因政策分歧退出。

沃拉斯的主要著作有:《费边论丛》、《弗朗西斯·普莱斯的一生》、《政治中的人性》、《伟大的社会》、《我们社会的传统》及《思维的艺术》等。其中《政治中的人性》及其姊妹篇《伟大的社会》被认为是现代政治理论的经典著作。

《政治中的人性》可以说是一部政治心理学著作。作者利用在伦敦市政选举中所获得的经验以及作为伦敦教育委员会和伦敦郡议会的一个非常活跃的成员所得到的观察力,结合心理学研究成果,来解释民主问题。

沃拉斯提出,要研究政治中的人性,首先必须克服“唯理智论”。他指出,传统的政治理论大都强调“人是理性的”,而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刺激下行事,大多数人的大多数见解并不是受经验检验的推理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无意

识的推理结果,它们是非理性的。因此,作者认为,人性是由理性及非理性两种因素构成的,文明的希望在于取得人类理性的胜利。然而普通形式的民主对此却没有什麼帮助。比如,公职候选人可以利用人们下意识的心理去捞取选票;充满情感内涵的文字和图像被政治演说家利用,而投票人在巧妙的口号或很有吸引力的标语的诱惑下,往往因感情冲动而被他人利用。在谈到政治道德、代议政体、官员以及国家与人类等问题时,沃拉斯结合大量事件论述了唯理智论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揭示出西方民主制度的局限性与种种弊端。与此同时,作者也很关心政治制度的改革,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原则,遗憾的是,这些问题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

在研究方法上,沃拉斯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政治,主张政治学要研究人的行为,从而开创了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

本书 1908 年首次出版,现据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 1915 年版译出。

1992 年 8 月

序

我向几位好心阅读本书校样，并给我提出勘误和意见的朋友表示谢意；其中我特别要提到约翰·亚当斯教授、J. H. 米尔黑德教授、A. 沃尔夫博士以及 W. H. 温奇、悉尼·韦伯、L. 皮尔索尔·史密斯和 A. E. 齐默恩等先生。正是为了他们的缘故，我要补充说，书中有些见解仍予以保留，对于这些见解，他们中的一人或多人是会希望删去或换一种表达方式的。

我已尽力在脚注中标明其著作曾被我引用的各位作者。但是这里我要对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特别表示感谢，多年前，此书曾使我冀望从心理学角度来思考我作为政治家和教师的工作。

经常有人要求我推荐一份关于政治心理学的书目。我认为，在该门科学的现阶段，政治家根据其切身经验阅读那些不专门涉足政治的心理学论文获得的好处，要胜于从阅读实用政治心理学文献着手。然而，非政治家的读者将会发现已故 G. 塔德先生的著作，尤其是《舆论和民众》和《模仿的规则》两书以及 1908 年 7 月号《社会学评论》所载 W. 特罗特先生《群居本能》一文中引用的书详尽论述了一些要点。芝加哥的简·亚当斯小姐在《民主和社会伦理》中以独特和引人注目的观点研究了大城市贫民的政治心理学。

格雷厄姆·沃拉斯

再版序

我对本书初版几乎未作任何更动，只改正了少数词句上的错误。过去十八个月内英国议会、土耳其、波斯、印度和德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并没有改变我对现代政体产生的心理问题所作的结论。要用“崭新”的例子来代替我从 1907 和 1908 年的时事中汲取的例子，就必须做大量改写工作，这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除了初版所推荐的书以外，这里我还要加上 W. 杜格尔先生的《社会心理学》，特别是他对本能所作的分析。

格雷厄姆·沃拉斯

1909 年 12 月 30 日于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

内 容 提 要

(导言,第 1 页)

政治学的研究目前正处于令人不满的境地。在全欧美,代议民主已被公认为最佳政体,但是那些对代议民主的实际作用体会最深的人却常常感到失望和忧虑。民主并未扩及非欧洲种族,而在过去几年里,许多民主运动已告失败。

这种不满已导致对各种政治体制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但是晚近的政治著作对人性的各个因素却甚少注意。从前,政治学主要是以人性概念为依据的,但是由于 19 世纪初期教条主义政治学家声名扫地,现代政治学研究者引以为戒,竭力避免做任何能使人回忆起他们过去所采用的方法的事情。因此,心理学的发展虽已改造了教育学和犯罪学,而政治学却依然故我。

然而,人性研究被忽视可能只是政治思想的一个短暂阶段,已经有迹象表明这个阶段行将结束。

(第一部分——第一章——政治中的
冲动和本能——第 13 页)

要研究政治中的人性,首先必须克服政治学传统以及一般人的心理习惯所产生的那种“唯理智论”。

政治冲动不仅仅是对手段和目的进行考虑后所作出的理智推理,而且也是先于个人的思想和经验、尽管为思想和经验所修正的意向。只要留心一下诸如个人喜爱、恐惧、嘲笑、财产欲等冲动在政治中的作用,就可以明白了。

我们的一切冲动和本能如果是“单一”的,其直接效果就会大大增加,如果是“第一手”的,与我们早期的进化阶段相联系,其永久性的效应也会大大增强。在现代政治中,我们从报纸获得的感情刺激一般都是单一的,然而却是“第二手”的,因此来得容易,去得也快。

一种感情或冲动的经常重复往往是令人苦恼的。政治家像登广告者一样,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而这又与人既需要隐私又难忍受孤独有关,我们必须据以调整我们的社会格局。

政治感情被许多人同时在身体紧密接触情况下体验常常会强化到病态狂热的程度,但是英国的政治状况不常产生这种现象。

国际政治的未来主要看我们是否对属于一个和我们不同的种族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憎恨本能。这个问题还没有获得解决,但是许多往往被说成是这种本能所产生的事情似乎是起因于其他被联想修正了的更普遍的本能。

(第二章——政治实体,第 37 页)

政治行为和冲动是人性与其环境接触的产物。在政治家所研究的时期内,人性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政治环境却以与日俱增的速度发生变化。

我们的环境中那些引起冲动和行为的事情是通过我们的感官传达给我们,并由我们对其重要意义的本能的或后天的了解从众多的感觉和记忆中选择出来的。在政治中,被认识的事情多半是人自己做的,我们对其重要性的了解不是本能的,而是后天的。

认识往往附属于象征,这些象征取代了更为复杂的感觉和记忆。政治中有些最困难的问题产生于在推理中有意识地使用称为“词”的象征与这些词在激发感情和行为方面多少有点自发的和下意识的作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个其重要性曾被联想确定的政治象征可能有它自己的心理发展过程,与它原来所象征的事实的历史无关。这一点可见诸国家和政党的名称及标记,而更清楚地见诸“茶叶”或“肥皂”这类商品的历史,这些商品在它们将要象征的物体生产或选定之前已经被广告变得风行一时。一个政治家的见解改变得极其迅速,他的声望、他所属政党的名称或者他所控制的报纸的传统特色却改变得极其缓慢,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产生道德上的麻烦。

(第三章——政治中的非理性推理,第 63 页)

唯理智论的政治思想家们常常不仅假定政治行为必然是对手段和目的进行推理的结果,而且还假定一切推理都属于同一“理性”类型。

在川流不息的心智经历中,要严格区别理性推理和非理性推理是困难的,但是人据以形成其政治见解的许多半无意识过程是非理性的,这一点却是清楚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可以信赖非

理性推理，因为非理性推理在被大量偶然的巧合强化之前，不会产生有意识的见解。但是，魔术师和其他研究我们的非理性心智活动过程的人能够巧妙地利用它们，使我们产生荒唐的信念。经验主义的政治艺术主要在于通过故意利用下意识的非理性推理来制造舆论。推理过程可能超过发动该过程的政治家所期望的程度，它在一个被动消极的报纸读者心中和一群最激昂的人中都可能发生。

（第四章——政治推理的材料，第 73 页）

但是，人能够推理而且确实也在推理，虽然推理只是他们的心智活动过程之一。希腊人制定的有效推理规则主要是用于政治的，但是事实上推理在政治学中比在自然科学中难度更大，成就更小。主要原因在于推理材料的性质。我们必须选择或制造可供推理的实体，正如我们选择或制造实体以刺激我们的冲动和非理性推理一样。在自然科学中，这些选择出来的实体有两种类型，要么是完全相似的具体东西，要么是些抽象的特质，根据这些特质，本来不相似的东西可以作精确的比较。在政治中，第一种类型的实体是无法制造的，政治学家们不断地探索第二种类型的简单实体，某种可以当作政治估计的精确“标准”的因素或特质。这种探索至今未获成功，而生物学的类推表明，当政治家像医生一样避免使材料过分简单化，并立志在推理中使用尽可能多的关于人的类型及其个别差异和环境的因素时，就最有可能获得有效推理的力量。生物学家已经表明，关于任何一个类型中的大量个体差异，只要按照连续的

曲线而不是作为同一的规则或任意的例外加以排列,就能被记住。另一方面,人性因素可能以连续方式排列,但如果将环境因素也以同样方式排列,就可能导致错误的结果。历史研究不能等同于生物学研究。

(第五章——政治推理的方法,第 89 页)

政治推理的方法,也具有题材过于简单化的传统。

在经济学中,方法和题材原本要简单得多,但自从杰文斯时代以来,“定量”方法已逐渐取代“定性”方法。政治学中类似的变化能达到什么程度呢?

有些政治问题显然是可以从量的角度来论证的。其他问题量的因素不太明显。但即使是最复杂的政治问题,富有经验和责任心的政治家实际上也从量的角度加以思考,尽管他们用来获得结果的方法往往是无意识的。

不过,当所有的政治家都从唯理智论假设着手时(虽然也有些政治家半无意识地养成量的思维习惯),许多人由于幻想破灭和反感而彻底抛弃了政治。培养政治家需要完全有意识地阐述和接受那些学过就毋庸抛弃的方法。

这样一种有意识的变化正在各皇家委员会、国际会议以及其他必须把大量专门搜集到的证据加以归纳并作出结论的团体和个人的工作中发生。他们使用的方法和词汇,即使不是用数字表示的,现在基本上也是定量的。

然而,在议会演说中,过分简单化仍积重难返。

(第二部分——第一章——政治道德,第 109 页)

但是,政治学中的这些变化以何种方式影响政治力量的实际动向呢?

首先,政治思想家和作家摒弃唯理智论的政治概念迟早会影响实干政治家的道德判断。一个年轻的候选人对于同那些其愿望和见解他试图影响的人的道德关系会有一种新的认识,并从这种新的认识开始工作。就这点而论,他会从一个至今只有那些被经验变得玩世不恭的政治家才有的立场着手。

如果我们的新知识的结果仅限于此,政治道德可能变得更糟。但是变化将会深远得多。当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过去没有意识到或仅仅半意识到的心智过程时,他们不仅会提防别人来利用他们的那些过程,而且还能够更好地从内部予以控制。

然而,一个有意识的道德宗旨要坚强得足以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克服日益提高的政治宣传技能的话,从内部控制这一概念必须成为一个理想的实体,这个实体要像“科学”一样,能诉诸大众的想像力,并以有组织的教育体系广为传播。这方面的困难是巨大的(部分地是因为我们对自我意识对本能的种种反应缺少认识),但是因果概念广泛传播和道德感情增强是不矛盾的。

(第二章——代议政体,第 130 页)

我们的政治心理基础概念中正在发生的变化还会使关于代议

民主的辩论重新展开。

在辩论中,一些老的论据将不再被承认为有效,不少政治思想家(尤其是学过自然科学的)很可能会重新捡起柏拉图关于由一批经过选择和受过训练、生活在“表面世界”之外的人掌权的专制政体的建议;虽然英国在印度的经历表明,即使最精心选择的官员也仍然只能生活在“表面世界”之内,而所谓“好政府需要被统治者同意”这一论据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它固有的唯理智论联想。

然而,我们思考政治的新方法必然不仅会改变“同意”这一论据的形式,而且还会改变“同意”借以表达的制度的形式。一次选举(和陪审团审判一样)将会被而且已经开始被看作是在正确条件下作出正确决定的方法,而不是将业已作出的决定予以确认的机械手段。

各种关于使老的唯理智论传统持续下去的选举改革的建议仍层出不穷,而政权的普及也会使代议政体的运行发生新的困难。但是那种既要增进选民的知识 and 公共精神又不许对选民施加过重压力的代议概念将会传播开去。

(第三章——关于官员的思考,第 155 页)

对普选产生的政治力量进行的定量观察表明,非选举产生的官员的工作在任何有效民主组织中都是重要的。

非选举产生的官员与选举产生的代表之间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英国的舆论已经显示出一种反对唯理智论代议政体概念的迹象。我们承认下述事实:绝大多数国家官员是由一

项既不是被个别议员也不是被整个议会操纵的制度所任用的,官员只要忠于职守即可保持职位,他们是我们据以作出政治判断的某些最困难问题的主要信息来源。同一制度未贯彻于我们的地方政府纯属偶然。

但是,这样半无意识地把一个部分地独立的文官系统当作一个既成事实来接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我们想要我们的官员做些什么,并研究我们目前的任用方式,尤其是我们目前的组织官员工作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实现那个意图的最有效手段。

(第四章——国家和人类,第 172 页)

政治思想中的各种新倾向会对政治团结的感情条件和理智条件产生什么影响呢?

在古老的城邦里,政府的管辖范围与人的视力和记忆力所及的范围相一致,可以发展一种地方感情,而在目前“消除了地方性”的人们中则不可能。因此,一个现代国家的团结不能取决于观察到的事实,而只能取决于想像的事实。

现存欧洲民族国家的两位缔造者马志尼和俾斯麦认为,一个国家的可能的幅员取决于民族同一性,亦即一个国家的每一成员必须相信所有其他成员都和他自己相像这一可能性。俾斯麦认为真正的同一程度是这种信念的必要基础,可以用“铁血政策”取得;马志尼则认为人类已经分成许多同一的集团,欧洲应按其界线重建。两者都深信不同民族类型的个人之间是不可能有什么政治团结感

情的。

在过去二十五年里,这个关于由许多同一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概念已被下述两点变得更加困难:①现代国家中各种独立的民族感情继续存在和甚至增强;②事实上,欧洲人种和非欧洲人种已处于更密切的政治关系。因此,企图把民族同一和团结的传统转嫁给一个现代世界帝国的全体居民或其中居统治地位的种族成员,是抹煞事实真相,并增强了战争的危險。

但是,我们能获得一种不是基于对每个人都相像的信念而是基于每个人都不相像这一认识的政治感情吗?达尔文关于个人与种族差异之间关系的证据如果不伴有作为一种道德责任的“生存斗争”概念,就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感情。事实上,种族间甚至帝国间的战争可被比作物种进化中必不可少的阶段。但是当代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种族都可以从个人的自觉合作而不是盲目冲突中最有效地获得进步;整个物种的进步也会来自以承认种族及个人差异的价值为基础的自觉的世界性宗旨,而不仅仅来自斗争。

目 录

序.....	1
再版序.....	2
内容提要.....	3
导言.....	1

第一部分 问题的状况

第一章 政治中的冲动和本能	13
第二章 政治实体	37
第三章 政治中的非理性推理	63
第四章 政治推理的材料	73
第五章 政治推理的方法	89

第二部分 进步的希望

第一章 政治道德.....	109
第二章 代议政体.....	130
第三章 关于官员的思考.....	155
第四章 国家和人类.....	172

导 言

政治学的研究目前(1908年)正处于非常令人不满的境地。

乍看起来,关于最佳政体的大论战似乎已最后解决,代议民主政体高奏凯歌。四十年前,把一个大的现代国家的主权置于普选基础之上,至少在欧洲,仍然可被说成是一个从未成功地进行过的试验。确实,英国凭借1867年的“冒险行动”^①,成了当时唯一的一个实行民主和代议政体的欧洲大国。但是今天,一个以普选为基础的议会共和政体存在于法国,没有遭到重大的反对或抗议。意大利享有显然十分稳固的君主立宪制。奥地利刚宣布实行普选。就连德皇在1907年选举后也自称是一场普选运动的胜利的领导者,而不是神权的继承者。绝大多数俄国人强烈地希望有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而反动的杜马发现自己被形势不断向那个局面推进。最信奉教皇至上主义的罗马天主教徒要求给教皇管理教会财产的世俗权力,不再是作为理想的世界政府体系,而是作为在区区数平方英里意大利领土内为一个教会的领导人争取行动自由的应急手段,这个教会的几乎全体成员将始终是各立宪国家的选民。没有一个与十九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相联系的非代议民主制建议曾获得公认,也未能以明确的建设性纲领姿态出现;而

^① 指1867年英国第二个选举法修正案通过。——译者

今天,几乎所有那些希望借助社会变革使现代科学工业成果分配得更公平的人,都对工人阶级的选举活动寄予希望。

然而,就在那些最全心全意地接受代议民主的国家里,政治家和政治研究者们似乎对他们的亲身体验迷惑不解,大失所望。美国在这方面进行了最持久的试验。他们的宪法已存在一又四分之一一个世纪,尽管对宪法细节的不同解释曾引起争议甚至战争,但是宪法的原则几乎始终没有受到过挑战。但是,就一个英国观察者所能判断,没有一个美国人对其力量在联邦、州和市的政治中还在不断增强的选举“机器”感到满意。

在英国,不仅我们对代议民主的经验远远不及美国,而且我们的政治传统也倾向于使民主观念甚至在民主体制的运行下也迟迟得不到充分认可。然而,即便具体情况不同,英国最忠诚的民主主义者(如果他们与选举组织的细枝末节有密切关系)同样显示出一种在美国已变得更为明显的失望情绪。我曾经帮助进行过许多次议会竞选,也曾经在一连五次伦敦市议会选举中当过候选人。在上次竞选中,我听到我的两位游说者在谈论当天的工作时不约而同说了一句:“这事情真怪。”我在英国听到不少职业政治代理人说过同样的话,而这些人效率却取决于他们实事求是地看待选举,不抱任何幻想。我对德国或意大利的竞选活动没有亲身体会,但是一年前当我和巴黎市议会的议员们谈话时,我从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身上仿佛看到对民主选举制度的运行有幻想破灭的迹象。

在英美,人们还有这样一种感觉,似乎产生最伤脑筋问题的是社会的新生力量,而不是腐朽力量。在美国,选举“机器”表现最恶劣是在那些其人口、财富和能量代表着其余美国文明显然正在追

求的目标的新的大城市里。在英国,对任何一个目光远大的人来说,老的渔港的猖獗的贿赂,或者大城市的传统的和为数可观的贪污,似乎都是些比较小和容易对付的弊端。更令人严重不安的是富豪和企业的最新花招、现代化的报纸、支配巨额工业资本积累的人的权力和手腕以及工人的有组织的政治热情,这些工人念过小学,居住在方圆数百英里的新的、卫生的、难以区别的郊区街道上。每过几年,就发明一种新的政治方法,这种方法如果行之有效,两党就都予以采用。政治就像踢足球,流行的战术不是制定规则的人期望的那些,而是球员发现能赖以取胜的那些,而人们隐约感到,他们的党最可能赖以获胜的权宜手段并不能把国家治理得最好。

更重要的是—种恐惧心理(往往表现在政治中发生新的问题之际),唯恐现行选举制度承受不住强化了的社会冲突的压力。英国人讨论关税问题、美国人讨论资本集中问题、或德国人讨论社会民主问题,使用的论据不少都含有这种心理。人们说,只要不发生那些促使拥有财富和工业权力的人充分利用他们的机会的问题,普选就能运行得相当顺利。但是,如果哪一个现代国家的富人们认为,为了保证—项税率,或使—个托拉斯合法化,或反对—项没收性税,值得将他们的三分之一的收入捐献给—项政治基金,那么,任何一种已制定的《惩治贪污法》都休想阻止他们花这笔钱。如果他们这样做,还得学许多本领,而制造情绪和舆论的本领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整个政治较量的状况今后将为之改观。任何一个现有的政党,除非大大增加其基金,或找到其他新的政治力量来源,都难保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不过,以选举纯洁的名义呼吁贸易保护主义者、托拉斯提倡者以及社会主义者放弃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运动,把政治局限在一些比较不太刺激的问题上,这种呼吁自然被充耳不闻。

还有,将选举权授予妇女的建议遭到了对自己的智力基础心中无数的政客们所特有的那种迟疑和规避。一个正在就民主的各项原则发表宏论的候选人在受到诘问时,觉得很难想出一个理由为继续剥夺妇女的选举权辩护。正因为如此,在1906年大选中,两大党获胜的候选人都发誓要支持妇女选举权。但是,当我撰写本书时,发誓的人当中有不少,可能是大多数,似乎正在竭力避免履行誓言的必要性。没有理由认为他们这些人极端不老实,他们对于一个最后决定可能产生的结果的顾虑显然是真诚的。他们知道男女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别,虽然他们并不明白这些差别是什么,也不懂它们怎样同选举权问题有关。但是,他们的疑虑甚至比誓言更加不牢固,在不久的将来,问题可能因一方坚决要求,另一方顺水推舟而了结。

这种对于明确政治论争中被当作业已解决的问题的未决感,由于种族问题日益紧迫而加重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欧美的民主斗争是由一些光为欧洲种族着想的人进行的。但是,1870年后,民主不断扩张,世界列强几乎都致力于掠夺热带属地,交通工具的改进使世界上所有的种族交往日益密切。老百姓如今发觉,至高无上的选举权实际上只属于一些起源于欧洲的民族(只有为数甚少的例外)。但是,代议原则的形式或历史似乎都没有任何东西可证明这种状况是正确的,也提不出任何东西来代替选举权作为政府的基础。老百姓也无法从民主国家给或不给非欧洲国民选

举权这一实践中得出顺理成章的结论。例如，美国已悄悄地、几乎一致同意地放弃了黑人选举权的试验。在这件事上，由于西非黑人与北欧和西欧白人之间智力相差悬殊，问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至今还没有认认真真去谋求新的解决办法。美国人在处理中国、日本和斯拉夫移民所引起的、或统治菲律宾多种民族所产生的更微妙的种族问题时，显然大伤脑筋，左右为难。

英国及其殖民地在非白种移民和占领热带属地所产生的政治问题面前同样显得举棋不定。甚至当我们讨论亚洲各独立国家的政治前途时，例如“无代表权不纳税”的原则是否应被看作对它们适用，我们也不清楚。我们自己作为亚洲霸主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波斯的发展，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在某些方面可以自称比我们聪明。当他们采用我们的工程、机械或军队体制时，我们深信不疑他们是在为自己做一件好事，尽管我们可能会担心他们在贸易上或军事上同我们对抗。但是，现在没有一个边沁的信徒急于把我们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最新发明输出供亚洲国家普遍使用。我们听说波斯人已经成立了议会，正密切注视着他们的试验的发展，而对它可能产生的结果完全不作判断。我们帮助日本人维护他们作为一个立宪国家的独立，大多数英国人也隐隐地对中国进步分子争取民族独立和内部改良的愿望表示同情。然而，一个中国人问他是否应该投身于争取一个欧洲式议会的运动，我们当中却几乎没有人愿意给他明确的忠告。

在我们自己帝国内部，这种对我们政治原则限度的不确定性随时都会产生实际的灾难。比方，在非洲，居住在我们领地上的欧洲人与非欧洲人如卡非尔人、黑人、印度人、哥普特人或阿拉伯人

之间的政治关系是按照与纳塔尔、巴苏陀兰、埃及或东非完全不同的方式处理的。在每一种情况下，体制上的差别不是由于当地问题的性质而是由于历史的偶然，随时随地都可能因为欧洲人侵犯英国政府保留给非欧洲人的权利，或者因为非欧洲人起来造反而出乱子。黑人和白人都因为内罗毕实施一条法律，德班实施另一条法律而恼火。

当然，这种情况就印度来说最为危险。在二、三个世代内，一位普通的英国自由党人对印度政治迟迟不作决定，因为他认为我们是在教育印度人进行自治，到时候他们都会投票赞成建立印度议会。现在，他已逐渐懂得，印度有许许多多种族，那些种族本身之间的一些最重要的差别，以及每一个种族与我们自己之间的差别，都不是教育所能消除的。他所尊敬的人告诉他说，这个事实使得适合英国的代议制绝对不适合印度，因此他只好继续战战兢兢地为三亿人的永久专制统治负责，时不时记起这些人或他们的邻人中的一些人可能有比他自己明确得多的政治观念，他最后也许必须为一个他一点都不希望保持的政权作斗争。

与此同时，印度问题的存在使英国自由党人下意识地放松了对国内问题的民主原则的掌握。报纸、杂志和轮船不断使印度对他变得更为真实；要不是他默认了不给拉其普特人、孟加拉人和印度袄教徒选举权的决定，那他对于波兰移民或伦敦“住旅馆”选民应该有选举权的信念就会更加坚定明确。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讲究实惠的政治家们仅仅因为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觉得竞争的规则需要重申，可能还需要重订，就在运动中途停顿下来。但是，竞选的胜负不会把一个国家的政治责任消耗

干净,可能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现在这样更迫切需要把各项政治原则公正地予以检查。迄今为止,促进政治思考的主要动力是战争和革命,是希腊城邦反对波斯人的斗争以及城邦内部争夺霸权的灾难性斗争,或者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宗教战争以及十八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然而,到目前为止,当代欧洲突出的社会事件是各项伟大运动的失败而非胜利;俄国由于改良者当中根深蒂固的知识分子的倾轧以及现代化武器和交通工具使无论多么暴虐腐败的政府都占有军事优势而明显地使忠诚和勇气付诸流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被宗教和爱国主义的势力以及他们自己的信条一无结果所挫败;美国接连出现的民主浪潮在资本掌握的政权下显得软弱无力。

但是,失败和迷惑可能像最成功的革命一样向人们提出严肃思考的要求,这种要求目前正在许多方面得到满足。政治经验以前所未有的严密性和精确性被记录下来并加以研究。以往的政治活动史不是交给学者去关起门来研究,而是成为有组织的、分工精细的课题。当前许多新的政治发展,如澳大利亚联邦、瑞士的公民投票、德国的公共财政、英美的政党制度以及其他无数事例,都在行销全球各大学的专门论著和技术性杂志中不断获得记录、讨论和比较。

对一个一、二百年前的政治思想家来说,现在唯一缺少的一种研究方式,是按照政治与人性的关系来研究政治。过去时代的思想家,从柏拉图、边沁到米尔,都对人性有独到的看法,并把那些看法作为思考政治的基础。但是,现代的政治学论文,无论探讨制度也好,讨论财政也好,没有一篇具有像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则》那样

的开场白：“大自然把人类置于痛苦和快乐两位主宰的统治之下”，也没有一篇具有像纳索·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那样的“大前提”：“人人都想以尽可能少的牺牲获得更多的财富”。在大多数作品里，人们甚至无从知道作者到底是否有意识地拥有任何人性的概念。

要懂得这种情况如何发生，是很容易的。政治学的过于自信的表白在十九世纪上叶遭到公认的失败以后，刚刚开始恢复一些威信。边沁的功利主义在取代天赋权利和法学家的盲目传统，成为全欧洲无数法制改革和体制改革的基础以后，由于普通老百姓不相信快乐和痛苦是人类动机的唯一源泉而夭折了。大学和报纸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麦卡洛克、西尼尔和惠特利大主教的政治经济学企图从人性的“少数简单原则”推断整个工业体制，其下场甚至更惨。它被等同于维多利亚女王统治前半期富人们企图赖以使劳动人民相信生活中好东西分配的任何变动“在科学上俱属不可能”的浅薄的教条主义。马克思、拉斯金和卡莱尔^①善于讽刺挖苦，他们用来慢慢地迫使报纸放弃“政治经济法则”（这些法则从1815至1870年像大腹便便的警察那样屹立着保护地租和利润）的方法至今尚未被人们忘怀。

正当反对“政治经济学”的斗争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展现了一个世界，其中那“少数简单原则”似乎有点荒唐，迄今还没有任何东西取代它们。确实，赫伯特·斯宾塞先生企图把他从生物进化史仓促得出的结论变成他本人的一门完整

^① 卡莱尔(1795—1881)：英国作家、评论家、历史家。——译者

的社会学,并宣扬一种“仁慈的私人战争”^①,把这场战争完全等同于1884年在英国小店主中流行的那种程度的生意竞争。斯宾塞先生甚至没有获得报纸的全心全意的支持;但是就他的体系广为流传来说,它有助于进一步使任何使政治学与人性研究相结合的企图声名扫地。

因此,目前差不多所有研究政治的人都分析体制而避免分析人。诚然,自从人类进化学说创始以来,心理学家研究人性的工作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是这个进展过程并没有影响政治研究,也没有受政治研究的影响。现代的心理学教科书充满了无数从家庭、学校、医院以及心理实验室汲取的例证,但是对政治几乎只字不提。确实,新兴的社会学教授们正在开始不仅按照人性与家庭、宗教和工业的关系,而且还按照人性与某些政治制度的关系来研究人性。然而,社会学对政治学的影响至今仍微乎其微。

我个人认为,这种把政治研究同人性研究割裂开来的倾向只是思想史上一个短暂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延续期间,它对政治学以及政治行为的影响很可能是有害的,已经有迹象表明这个阶段行将结束。

常有人说,如果工作要做得彻底,道德科学必须像自然科学一样有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政治研究者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一种人性概念,自觉性越差,越可能被这种概念支配。如果他本人有丰富的政治生活经验,他的不自觉的假设可

^① 《人对国家》第69页。“仁慈的私人战争使一个人拼命从另一个人的肩膀爬上去。”

能是有用的；如果没有的话，那它们肯定会使人误入歧途。例如，罗斯福先生论《美国人的理想》这本小册子是有用的，因为当他考虑到政治中的人时，他考虑的是他所熟知的政治家。读过这本书的人 would 感到美国大学教授们所写的许多更系统地论述政治的书是无用的，就因为作者们谈论的是些抽象的人，这些人是按照他们所觉察不到的、从未以经验或研究核实过的假设形成的。

在涉及人的行为的其他学科中，研究所做之事与研究做该事之人之间是没有区分的。在犯罪学方面，比卡利亚和边沁早就指出，那种把罪行的分类同对犯人的研究割裂开来的法理学是多么危险。他们所掌握的人性概念已被进化心理学取代，但是诸如隆勃罗梭这样的现代思想家已把新的心理学用来为一种新的和富有成效的犯罪学服务。

还有在教育学方面，洛克、卢梭、赫伯特以及博学多才的边沁都把他们的教育理论建立在人性概念之上。这些概念和作为他们的政治理论基础的概念是一样的，而且都受现代知识的影响。在短短一个时期内，就连英国师范学院的教师们也打算像在政治中一样把研究人的体制同研究人性区分开来。在这个时期内，教学方法的讲授与教育理论的讲授各行其是。前者仅仅成为最佳学校的组织和教学的叙述和比较，后者则是孔美纽斯、洛克或卢梭等经典作家的解说，偶尔也穿插些评论和批评；它们酷似那些关于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非正式讲话，这些讲话冠以政治理论的名义，在我当年在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时构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插曲。但是，虽然牛津讲座依然故我，师范学院关于教育理论的讲授却开始发生变化，同医科学生培养中发生的变化一样巨大，解

剖学的教师们不再讲解权威人士的经典著作,而是开始自己负起责任,最充分地说明他们所掌握的有关人体构造的因素。

这个变化的原因显然是: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讲师往往不是政治家,师范学院的教学理论讲师却无一不是教师,对他们来说,任何新知识能否有助于他们的工作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人们发现,在威廉·詹姆斯、劳埃德·摩根和斯坦利·霍尔等教授的领导下,一门进步的教育科学正在蓬勃发展,它一方面研究各种类型的学校组织和方法,一方面刻意从专门实验、内省以及其他学科了解儿童的真实情况。

以现代心理学为基础的现代教育学已经对其教师受过专业训练的学校发生影响。教育学的事例逐年增加,它已经避免在沉闷的授课上浪费许多时间,已经使数以千计的教师对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并且使千千万万儿童增进了知识和快乐。

我写本书是为了说明:政治学状况的相应改变是可能的。在庞大的大学人员队伍里,一批数量不断增加的政治学教授和政治研究者在孜孜不倦地埋头工作。我不由地想到,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当中更多的人将会求助于那种作为道德科学老伙伴的对人的研究。在每一个大城市中,许许多多的人由于希望获得比目前的政治论战更使人满意的东西而在晚上聚会。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领导和老师,在这些人身上,已能看出对提供的替换办法表示不耐烦,这些办法要末是单纯将现行各种机制作比较,要末是奢谈社会主义或个人主义、民主主义或贵族主义对人的合适性,而人的天性则被认为理所当然。

如果拙著为任何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思想家所阅读,我将极力

主张：对政治中的人性的研究工作如果由许多饱学之士通力进行，不仅会加深和拓宽我们对政治体制的知识，而且还会打开一个未被发掘过的政治创造力的宝库。

第一部分

问题的状况

第一章 政治中的冲动和本能

任何人要想以重新检查人性的作用当做他的政治思想的根据,必须首先克服他自己夸大人类理智的倾向。

我们往往认为人的每一行为都是理智作用的结果,人凭借理智首先考虑他期望的某个目的,然后再估计据以达到那个目的的手段。比方说,一个投资者期望的是绝对安全外加百分之五利润。他用一个小时认真研究股票行市表,最后断定购买酿酒厂股票能使他最充分地实现他的愿望。鉴于他冀求绝对安全的固有愿望,他的购买股票的行为似乎是他的推理的必然结果。安全的愿望本身似乎可以进一步看成仅只是对满足全人类所共有的对“幸福”、自身“利益”或诸如此类东西的更普遍愿望的手段的一个理智推断。满足这种普遍愿望可以被当作人生的最高“目的”,我们的一切行为和冲动,无论大小,都来自于同一理智作用,犹如从一个论点的前提得出结论。

这种思想方法有时被称为“常识”。它应用于政治的一个良好例子可见之于1829年3月号《爱丁堡评论》中麦考莱对边沁功利主义信徒的著名抨击中的一段话。奇怪的是,这个政治奠基于教条

主义心理学的极端例子竟是旨在说明“绝对不可能从人性原则推断政治学”的论点的一部分。麦考莱问道：“哪一个关于人性的命题是绝对和普遍正确的？我们只知道一个：它不但正确，而且完全相同；即人总是根据自身的利益行事……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行为时，我们必然知道他认为他的利益是什么。”麦考莱自以为是彻头彻尾反对边沁的，但却无意识地采用和夸大了边沁及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多数哲学家所共有的假设——一切动机都来源于某一预先想好的目的。

如果逼他一下，麦考莱也许会承认，在有些情况下，人的行为和行为冲动是与任何达到目的的想法无关的。如果我眼里进了一粒砂子，请人家用手帕角把它擦掉，当手帕接近的时候，我总是会闭上眼睛，而且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这样做。谁都不会以为我闭上眼睛是因为我经过郑重考虑后，认为这样做符合我的利益。多数人临阵脱逃、堕入情网、或去闲谈天气，也不是为了达到某一个预先想好的目的。确实，如果用摄影机和留声机在一个人不觉察的情况下把他在普通一天中的言语举动统统录制下来，第二天当着他的面播放，他会惊奇地发现几乎没有什么言语举动是蓄意谋求达到目的的手段的结果。当然，他会发现他的不少举动是在习惯的影响下半自觉地重复原来更充分自觉的动作。但是，即使把一切习惯行为都去掉，他们会发现余下的只有极小部分可以解释成是理智估计的直接结果。如果另外把他的那些未导致行为的冲动和感情也记录下来，就可以看出它们同那些已导致行为的冲动和感情是一样的，它们当中绝少含有麦考莱认为理所当然的那种理智作用。

如果当时再逼麦考莱一下,他也许会承认,即使一个行为预先对目的和手段进行了估计,也并非那种估计的必然结果。即使我们知道一个人认为做什么对他有利,我们也不能肯定地知道他将会做什么。研究股票交易所全部上市股票的人,除非除了对这件事的理智推断以外,还有一种写信给他的股票经纪人的冲动,这种冲动强烈得压倒另一种把事情搁到明天再说的冲动,否则他是不会把股票买来的。

麦考莱甚至可能进一步承认,估计这一心智行为,其本身来源于或伴随着一种作估计的冲动,这种冲动同任何预先的对目的和手段的考虑毫无关系,而且从半自觉地服从一系列空想直至强使疲乏的头脑去进行精确思考这一艰难任务可以有許多变化。

心理学教科书如今告诫每一个学生要慎防我引用的麦考莱那段话所说明的“唯理智论”谬误。如今人们一致认为,冲动有一段它所特有的进化史,比它往往被借以指引和限制的那些理智作用的历史来得悠久。我们从遗传得来的机体使我们倾向于以某种方式对某些刺激作出反应,因为这些反应过去时候对维护我们的物种起过作用。其中有些反应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本能”,亦即对某些确切的行为或一系列行为的冲动,对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事先并不自觉地加以考虑。^① 那些本能往往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有时候,就人类和其他高等动物而言,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但是,它们所显示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是行为者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以往许多行为倾向中“适者生存”的结果。确实,有些本能在显然无用

^① “本能通常被解释为如此地行动以产生某些结果,这些结果未曾预见,过去也未受过这样做的教育。”W. 詹姆斯:《心理学原理》第2卷,第383页。